



□记忆

周总理和朱启钤

秦绪颜 华光

上图是1957年深秋的一个晚上,周总理来到北京东四八条朱启钤先生的住处,和朱先生畅叙时的一张老照片。

朱启钤(1872——1964),字桂辛,号醵园,贵州开阳人,举人出身,著名的建筑学家、收藏家、实业家,曾任清朝政府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、内城警察总监和津浦路督办等职,北洋政府时曾任交通部部长、内务部总长、代理国务总理等职。二十世纪初,入股山东中兴煤矿公司,曾任总经理、董事会会长、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长等职。

周总理和朱老先生可谓老友故交。这要从朱老先生的乘龙快婿章以吴说起。

1913年,周恩来和章以吴都在南开中学就读,并且两人都是南开中学新剧团能扮演女角的业余演员(那时女角都由男生来演),章以吴在剧中扮演A女角。眼看就要公演了,恰在这时,章以吴家父章棣火速催其回京完婚,新娘便是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先生的二女儿朱淇筠。情急之下,导演只好让周恩来顶替章以吴的A角“救场”。由此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同窗情谊。之后,章以吴做了朱启钤的私人秘书,时常约周恩来在朱启钤家畅叙,一来二去,也使周恩来和朱老先生结下了忘年之交。不久,章以吴和朱淇筠为朱启钤生了个宝贝外孙,他就是建国前后跟随周总理成长起来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。

1949年国共和谈时,章士钊先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之一到京。章士钊与朱启钤和周恩来都是老朋友了,故周恩来见面便问:“行老(章士钊字行严)先生,我你的老朋友朱(启钤)先生现在哪里,情形怎样,没去台湾吧?”章士钊便将朱启钤在上海寓居的情况如实相告,周总理当即授意行老给朱启钤写信,要他留在大陆,不要去台湾或香港。行老一连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往上海。朱启钤收信后,深感总理的拳拳深情,毅然留居上海。上海解放后,周总理即派章文晋将朱启钤一家接到北京定居。

回京后,朱启钤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热情,便联络中兴公司董事黎绍基、张叔诚、周叔廉等人,磋商复兴中兴轮船公司事宜。他仍被推举为董事长,并和大家一起决定召回滞留香港的18条轮船支援国家建设。经多方努力,除“中兴轮”暂留香港运营外,其余轮船悉数召回;接着,他又积极投入中兴煤矿公司的恢复重建工作。

1949年10月,朱启钤和黎绍基应邀参加了交通部召开的航务会议,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。总理详细询问了中兴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的情况,称赞“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”,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。

周总理深知朱启钤学识渊博,理政有道。1905年,他便在晚清创办了“京师警察”制度;1913年,他“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”,敢在皇城动土,改造紫禁城正阳门“治堵”,开通了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;他第一个提出“修旧如旧”的理念,也第一个颁布《胜迹保护条例》,被美国公使芮恩施称赞为“北京的奥斯曼男爵”;1929年,他邀梁思成、林徽因等学者创建了“营造学社”,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,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。鉴于他的学识和才干,总理推荐他担任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古代建筑修正所顾问。20世纪50年代,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,总理亲自征求朱老先生的意见,采纳了他所提出的3条宝贵建议。

周总理十分关心朱老先生的生活和健康。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,总理来到东四八条朱老先生的住处,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起居情况,问送给他的《参考消息》收到了没有,朱启钤说:“每天都拿给我看,就是有些字太小,没法看清楚。”总理说:“今后拿给你的文件用大字号印刷。”

总理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,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,问朱老先生知不知道,朱启钤说:“民国二年,我任内务部总长,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,当时他(周嘉琛)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。”总理打趣地说:“那你比我大两辈,我和章文晋同辈了!”朱启钤因耳背经常打断总理的话,家人就摆手示意不要让他打断总理的话,总理微笑着说:“不要阻止他,让老先生说嘛!”

朱启钤对葬俗改革有些保守,担心死后被火化,对总理说:“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?我不愿火葬,想死后埋在北戴河,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墓地,我怕将来办不到,所以才和你说,你帮我办吧!”家人忙又阻拦,总理又一次制止了人们,对着他戴的助听器简说:“我一定帮你办到,请你相信我,放心吧!”

多年的交往,使朱老先生深深佩服周总理的为人和领导艺术,他说:“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,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。可惜我生不逢时,如果早生30年,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,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就一定能办到。”

1961年朱老90岁生日时,总理送来个大花篮表示祝贺。几天后,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朱老举办了一次小型寿宴,并半开玩笑地说:“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,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饭?”朱老高兴地说:“好啊,那就请总理定日子吧!”

1961年12月7日,是总理约定好到朱家做客的日子。这天上午,因为总理要在一个大会上作报告,怕朱家人等得着急,就让邓颖超和章文晋、张颖夫妇先到。12点半,总理和孔原、童小鹏都来了。吃完饭,总理又陪朱老和家人谈话、合影留念。朱老特别高兴,后来他将手书的“松涛”缂丝小条幅亲自装裱送给总理以表谢意。

1964年初,朱老患感冒并发肺炎,住进北京医院。当时总理正出访亚非各国,当接到中央统战部关于朱老病情的电报后,立即回电请北京医院全力救治。但终因朱老年迈病重,2月26日,不幸病逝。临终前,他还时时念叨着远在国外的周恩来总理。

英雄虎胆贯长虹

——追念抗日英雄王延林

李海流



1939年时的中共滕县县委

点。旋即他们又摸到炮楼后头,正准备挖墙,发现有两个现成的洞口。爬进去一看,十几个鬼子正围着桌子唧唧哇啦地吃东西。他们相互点了点头,将一捆手榴弹同时拉开弦,扔了进去,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屋内的鬼子被炸成了肉酱,在炮楼上站岗的那个鬼子被一枪毙命从炮楼上掉了下来。此次行动不足20分钟,缴获机枪一挺、掷弹筒一具、步枪8支、短枪一支,子弹800余发。

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,入侵临城日军人数增加到700余人,日军更加残暴地抢夺朝鲜、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。慰安妇当时在临城被称为“女子挺身队”,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是被强迫来的军妓。当时的日军慰安所秘密设在临城大墙里,里面用水条、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,条件极为简陋。慰安所里强征囚禁的朝鲜青年妇女6名,她们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和任意蹂躏,稍有不从,便会遭到日军的暴打和虐待。

据兴仁村今年86岁的单厚恩讲,王延林有孤胆,为了夺取日军的枪支弹药,他在夜间偷袭临城伪军岗哨,截取日军步枪一支、手枪四支。不久他又和王玉莲两次夜闯临城日军大院,袭击日军慰安所。他们用洋镐挖开临城日军大院砖墙,在营房内截取



王延林之孙王广德(右一)与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之子(左一)一起看望铁道游击队员马世田

队要在临枣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大力开展对敌斗争,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、抗税,打击和钳制敌人的“蚕食”,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;分化、瓦解敌伪顽反动势力,争取抗日力量,以突袭的方式打击敌伪军据点。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,鲁南支队决定偷袭山家林火车站日军据点。

山家林车站位于临枣铁路的中心地段,驻扎着日军一个小分队,主要负责甘霖至匡山头的铁路安全,是临枣支线上日军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。这个据点的位置较高,铁路上有什麼风吹草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为了安全,日军在车站的四周挖了一道壕沟,壕沟岸上围一圈铁丝网,进出必须通过吊桥。

1941年夏的一个夜晚,云隙里露出朦胧的月色,四野一片寂静。鲁南支队的王玉莲和王延林带领10名队员带上长短枪和一捆手榴弹及两床棉被,向山家林车站逼近。他们顺着铁路间小道摸到鬼子据点附近的炮楼下,只见一个端枪的哨兵在炮楼上慢悠悠地来回走动,注视着远处的铁路。他们一行人悄悄地绕到炮楼后,把两床棉被往壕沟水面上一铺,静静地过了壕沟。再把湿漉漉的棉被搭到铁丝网上,俯窥着棉被进了据

铁道钳敌截布匹 付村受敌身遇难

1941年11月,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,部队穿衣成了问题。铁道大队得知这一消息后,决定联合沛滕大队鲁南支队、微湖大队等抗日武装从日军手中搞一些布匹。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副站长张允驥,了解到当天夜间11点有一批布匹南运。曹德卿、李云生等人化装成群众溜进车站,藏在张允驥的家中。到了晚上,列车驶入沙沟站,张允驥、曹德卿、李云生跃上火车,火车出站后,张允驥、李云生熟练地拔掉列车间的风管和挂钩销子,使车尾两节运布的闷罐车厢停在了沙沟黄庄弯道处。火车还没停稳,洪振黄、杜季伟、孙茂生、马世田、王玉莲、王延林、王延斗及数十名群众一拥而上,撬开大锁,打开车门,大捆大捆的布匹往下掀,下边动员来的几百名群众你争我抢,有的抬,有的背,有的推,有的扛,异常紧张繁忙,刹那间,出现了从黄庄到微山湖畔鄱山渡口十

在古薛大地上一直流传着王延林英勇杀敌,抗战牺牲的事迹。热血洒鲁南,肝胆照后人,王延林为抗日救国历尽艰险,身经百战,足迹遍及津浦、临枣铁路沿线,抱犊固山区、微山湖区及运河两岸,后因汉奸告密,不幸遇难。时至今日,他的英勇事迹在鲁南乡间陌里广为传颂。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,让我们一起来追念这位逝去70多年的抗日英雄。

王延林,枣庄市薛城区兴仁村人,190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,自幼入私塾读书,家教甚严。父亲王玉泮亦商亦农,农闲时在临城(今薛城)一街开了一家面坊,靠着家中几亩薄地和面坊维持生计。王延林生性豁达,慷慨好义、乐善好施,村中民众只要有求于他,他总是有求必应,鼎力相助。抗战时期,他在临城、兴仁、陶庄、山家林等地积极组织地方武装,投身于百里铁道线上,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,协同主力部队抗击日伪军。

众英豪群起抗日 上前线奋勇杀敌

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8日,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《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,号召“全中国人民、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,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,抵抗日本的侵略!”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出力,有钱出钱,有枪出枪,有知识出知识,全民组织起来抗战。

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,此时的鲁南抗日运动风起云涌,王延林在枣庄早期中共党员褚雅青的引领下,与同村族人王玉莲、王延斗、王玉新,李德祥、陈还存、陈还年等人秘密组织抗日自卫军,隶属于董尧卿、董一博创建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团,肩负着抗击日寇、汉奸队、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。

1938年3月,日军侵占滕县后,党组织为扩大影响,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团结包括滕县伪县长周侗、爱国人士孔昭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抗日,成立了“滕县自卫委员会”,主任委员王右池,秘书长李树勤。自卫委员会的职责是组织武装抗日,维持地方秩序。4月下旬,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同意董尧卿继续使用“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”称号,并任命其为第一支队司令。不久,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了沛县、滕县、峄县等地武装起义,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,5月在山亭区西集镇老古泉村成立了“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”,总队长张光中、政治委员何一萍、政治部主任王见新,领导和指挥苏北、鲁南各地方武装的抗日工作。此后,董尧卿、董一博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与友军第十军团暂编第六师,编入孔昭同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旅。

按照滕县自卫委员会的战略部署,王延林所在的部队自参加抗战以来,先后在滕县界河、东沙河、临城等地同日伪顽敌交战十余次,每次均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,毙伤不少敌人,军威大振。1938年3月17日,滕县被日军攻陷,为阻止日军南下临城,18日,王玉莲、王延林带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30余人在临城西仓桥与50余人的日军先遣队相遇。王延林指挥部队在蟠龙河畔抢占有利地形,向日军发起攻击。他扒下棉袄,光着脊梁,举起手枪,带领士兵埋伏在蟠龙河北岸伏击敌军,一时间杀声震天、枪声乱作一团,双方对峙了半个小时后,敌人得知是鲁南抗日自卫军,失掉了勇气,丢下4具尸体,狼狈向北逃窜。王延林率领众人乘胜追击十余里,敌人吓得魂飞胆丧,溃不成军。

台儿庄大战后,国民党军队南撤,鲁南沦陷,其县、区政府亦随之撤退,滕县、临城、峄县相继陷入敌手,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。不久,为充分发挥鲁南抗日自卫队、运河支队、微湖大队、铁道大队等几支队伍的抗战作用,鲁南特委派朱道南、杜季伟、董尧卿、孙伯龙等同志出山,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关系,很快把他们



发动群众破袭铁路